

国际投资协定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研究^{*}

孙玉红 陈相香 于美月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 2000~2014 年 WIOD 和 UIBE 数据,通过构建扩展引力模型分别检验了 43 个国家(地区)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和 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缔约方之间价值链贸易的作用效果。文章发现二者对于价值链贸易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BIT 对于价值链贸易的影响不大,但 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缔约方之间双边增加值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RTA 中的投资条款有助于缔约方以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且对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强;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南北型和南南型 RTA 缔约方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北北型 RTA 缔约方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为取得价值链贸易利益,各国政策制定者在参与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时可选取不同的策略。

关键词 国际投资协定 价值链贸易 RTA 投资条款 双边投资协定

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DOI:10.13516/j.cnki.wes.2020.08.006

一、引言

与贸易领域达成的多边国际贸易协定有所不同,投资领域尚不存在管辖全球投资问题的国际投资协定。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发起建立多边投资协议的努力,但是各方不同的利益主张导致该协议不得被搁浅。因此,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呈现出双边化、区域化的发展格局,由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BIT)和涉及投资议题的区域贸易协定(RTA)所构成。根据 UNCTAD 发布的 2019 世界投资报告可知,2018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为 1.30 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已持续增长至 3317 个^①,其中双边投资条约(BIT)数量为 2932 个,包含投资条款的贸易协定 385 个,有效实施的 BIT 数量为 2658 个,通报 WTO 且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294 个^②。需要注意的是,与 1990 年 19 个协定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增长超过了 15 倍。很多自由贸易协定内容超越 WTO 范围,包含专门的投资章节,其中的投资规则代表着当代投资条约发展的新动向(陈安和蔡从燕,2007)。这些投资规则与贸易规则结合在一起对投资、服务和贸易带来联动效应,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和国际生产分割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形成联动,必将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产生影响。

对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衡量,学术界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发展(IMF,2013)所产生的中间品和零部件贸易额来衡量价值链贸易^③,另一种方式是以国际投入

^{*} 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强度测评及提升策略研究”(批准号:18BJY183)资助。

^①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en.pdf.

^②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③ IMF. Trade Interconnectedness: The World with Global Value Chains. Washington, DC, 2013.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台湾的“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国”均应为“国(地区)”,“国外”均应为“境外”,“countries”均应为“countries(regions)”。

产出表核算出的增加值贸易来衡量价值链贸易。后者有别于传统的总贸易额统计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因中间品贸易高估一国出口规模而带来的“统计幻象”(Srholec M, 2007)问题,其核心是通过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将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分离出来,进而解决中间品重复计算问题,也可借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目前国际上的增加值分解方法主要是沿用王直等(2015)和Koopman等(2014)的方法,根据投入产出表(I-O)或国际投入产出表(II-O)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而国内外增加值又可根据出口产品的来源地与最终吸收地继续细分,其中间品国内增加值部分与国外增加值部分反映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经济收益,这一分解理论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

Baldwin(2011)指出,全球价值链贸易与传统贸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依托于贸易-服务-投资三位一体的复杂体系,需要21世纪的区域主义提供WTO难以提供的规则。Bruhn(2014)认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非传统议题的新规则格外重要。美欧政府一直侧重推动深度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其作为贸易规则制定的新平台(盛斌2010;沈铭辉2013),旨在填补WTO的政策缺口,同时也为了最大化跨国公司的利益。“边境内规则”能够保证货物和中间产品安全、快速、低成本多次往返运送,为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进行产品内分工生产起到决定性作用(UNCTAD 2013a)^①。上述文献为我们探析国际投资协定与价值链贸易关系奠定了基础。

鉴于价值链贸易产生于集贸易-服务-投资为一体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因此旨在服务于该体系的国际投资协定与价值链贸易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这意味着国际投资协定的兴起和演变格局影响到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投资利益,也关系到一国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选择,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检验其影响程度。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中国的RTA和BIT数量快速增长,其中已签署实施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有15个,涉及25个国家和地区^②。与此同时,中国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签署BIT。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127个国家签订了BIT^③,其中109个正在实施中。此外,中国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与美国和欧盟分别进行双边BIT谈判,在地区层面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旨在为本国企业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利益。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国际投资协定对投资的影响,而分析国际投资协定对价值链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部分研究甚至将国际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贸易归功于功能性一体化(陈勇2008;欧定余和陈维涛2012),而非制度性一体化。此外,对于RTA和BIT对一国参与价值链贸易利益和政策效果差异的研究尚处于空白。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国际投资规则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否起到了促进缔约方价值链贸易的作用?第二,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相比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独特。通过研究国际投资协定对缔约方之间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来考察协定的利益,超越了此前研究国际投资协定对投资的影响和贸易协定对价值链贸易影响的研究。第二,比较分析了不同投资协定的政策效果差异。通过区分不同种类投资协定的影响差异,阐述当代国际投资协定新方式的重要影响,从而揭示了各国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投资规则对价值链贸易的重要作用 and 利益取向。第三,比较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参与价值链贸易的影响。通过对比价值链贸易前后向联系影响的差异,间接探索国际投资协定对一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这对一国参与国际投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第四,从研

①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588>.

② <http://fta.mofcom.gov.cn/>.

③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by-economy>.

究方法来看,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增加信息容量,提升估计精度,并在模型中加入出口国和进口国时变固定效应和国家对恒定固定效应,降低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所产生的偏误(Baier等,2004)。

二、文献综述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梳理了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趋势和国际投资协定与价值链贸易关系两个方面的文献并分别加以论述。

1. 关于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趋势和结构的研究

国际投资协定是近年来数量增长最快的国际协定,由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构成(TIPs),后者是由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贸易投资协定(RTIAs)、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s)、合作协定、协会协定、经济互补协定、贸易投资框架协议(TIFAs)以及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共同构成。目前尚不存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投资协定(IIA),因此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性投资协定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主要构成形式。也就是说,IIA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特征。Jeswald和Salacuse(2010)认为管理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得以实现。金芳(2014)认为国际投资协定逐渐由一体化向分散和多层次方向发展,其架构机制由双边投资协定向区域性、诸边性国际投资协定的方向转变。张小波和李成(2016)也指出国际投资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在不断减少,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致力于区域与跨区域投资合作协议。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国际投资协议具有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但是主要以“嵌套式”和“重叠式”网络结构拓展,大范围的区域投资协定比较少。此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代表着国际投资协定的新趋势,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投资章节的内容超过其原有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为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打造了新的样板,代表着当代投资条约发展的新动向(陈安和蔡从燕,2007)。

2. 关于投资协定与价值链贸易关系的研究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全球价值链贸易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直接研究国际投资协定与全球价值链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少,一些文献研究了国际投资与价值链贸易之间的关系,还有部分文献探讨了国际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少数文献讨论了区域贸易协定与价值链贸易的关系。以下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国际投资协定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中,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发展阶段迥异或国际投资协定的异质性,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研究早期,Hallward-Driemeier(2003)通过分析双边投资协定在OECD国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影响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而Egger和Merlo(2012)利用德国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双边投资协定对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缔约国的海外投资。Berger等(2011)验证了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结论。此外,少数学者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和其中投资相关章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Lederman等(2005)认为墨西哥北美贸易协定(NAFTA)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加入协定后能够增加跨境投资的流入。Berger等(2011)指出,只有在区域贸易协定提供宽松准入规则的情况下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没有投资条款的RTA可能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孙玉红和许智贤(2018)的研究检验了FTA中货物和服务协定均有效促进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上述研究中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不尽一致,但是从理论层面看,双边投资协定规定了缔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包含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缔约双方提供可依据的法律规范,可减少甚至避免投资壁垒,有利于发展稳定的投资关系和私人投资活动(杨宏恩等,

2016)。因此,国际投资协定和 RTA 可以通过影响 FDI 的分布对国际生产网络分工产生影响,从而对价值链贸易产生影响。

从国际投资与价值链贸易关系的文献来看,赵立斌(2012)研究东盟五国跨国公司 FDI 和中间品贸易分工发现,跨国公司 FDI 在长期内与中间品贸易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Vechiu 和 Makhoulf(2014)发现,在欧盟内部 FDI 促进了各国不同经济部门及制造业内部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并加强了同一产品内部的零部件贸易。白光裕和庄芮(2015)对价值链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指出,跨国投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等方式推动了国际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密切联系。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产品内贸易是国际生产的主要特点,FDI 发展速度加快并促使各经济体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李平等,2018)。上述研究均得出垂直型 FDI 对价值链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一些学者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及其中的条款深度与价值链贸易之间的关系。全球价值链的本质是国际生产分割,是生产环节在国际生产网络下的扩散。张晓静(2015)研究了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与亚太生产网络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双向关系,亚太生产网络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区域合作一体化深度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等也推动了生产网络的构建。刘洪愧(2016)基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发展背景,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业增加值贸易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增进成员国间的增加值贸易,其中负面清单类型的协定促进作用更大。高疆和盛斌(2018)探究了贸易协定质量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协定对于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传统贸易,其构建的关税壁垒指标、核心指标和 WTO-X 指标可以促进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参与国际分工。具体到区域贸易投资规则,李艳秀(2018)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某些单项条款与价值链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增加值贸易,但对发达国家间的价值链贸易有抑制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间发展水平相近且在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地位相近。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趋势、国际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国际投资与价值链贸易的关系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将国际投资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联系在一起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本文拟实证分析国际投资协定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以探讨何种双边投资制度联系更有助于价值链升级。

三、典型事实

1. 国际投资协定(IIA)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投资协定是指国际经济体间缔结的用以规范投资国与缔约国有关投资活动的法律权益和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文本协议,由双边投资协定和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孙英哲,2018)构成。图 1 报告了 1980~2018 年间有效实施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1980~2000 年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迅速,几乎呈现直线式增长。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投资协定增长趋势逐渐放缓。截至 2018 年底,全球范围内国际投资协定共 2666 项,其中包括 2353 项双边投资协议和 386 项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

2. 主要国家价值链贸易发展特征

(1) 主要国家出口增加值率的发展特征

一国出口增加值是指本国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带来的价值增值并被外国所吸收的部分,是出口中本国创造的增加值净值。而增加值率是指出口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它反映了一国真实贸易收益与国际竞争力,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所获真实贸易利得及出口产业特征(Johnson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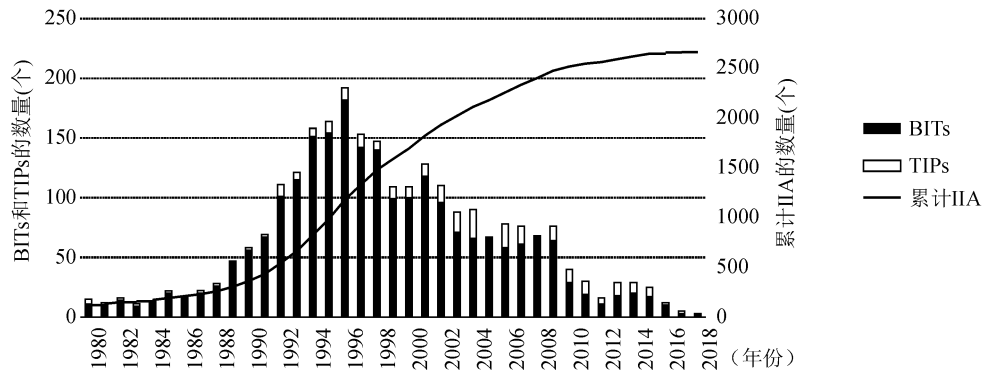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18年间国际投资协议发展趋势

Noguera 2012)。图2展示了15个代表性国家^①在2000年、2005年、2009年及2014年的出口增加值率。可以看出,各国出口增加值率均小于1,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已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中;多数国家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和物流成本降低促进了国家间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垂直一体化分工日益突出;以自然资源为出口导向的典型代表(如俄罗斯、澳大利亚等)的增加值率均稳定在80%以上,在价值链体系中处于上游位置;老牌发达国家(美、德、法、英、日)的增加值率均超过70%,这些国家凭借制造业产品出口与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高额增加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与印度的增加值率在80%左右,其中中国增加值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国内要素的地位不断提升,有逐步脱离加工贸易模式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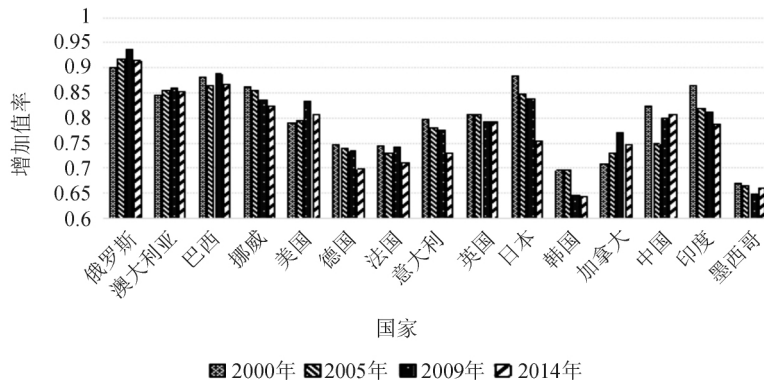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国家出口增加值率跨期特征

(2) 主要国家价值链参与度特征

增加值率虽然是衡量国家融入价值链的重要参考,但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两国可能会存在增加值率相同但嵌入方式完全不同的情况,Koopman等构建的参与度指标可以考量不同国家价值链的融入方式。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可以通过间接国内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份额 IV/E (前向参与度)与国外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份额 FV/E (后向参与度)来测度:

$$GVC_participation = \frac{IV}{E} + \frac{FV}{E}$$

其中 IV 代表间接出口增加值, FV 代表国外增加值, E 是以增加值衡量的总出口额。

代表性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时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资源代表性国家(如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① 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挪威、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印度。

呈现出较高的前向参与度与较低的后向参与度,这些国家主要是为中下游的外国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验证了上游自然资源产业出口导向模式,处于 GVC 顶端水平。

美国价值链参与度稳步上升,凭借技术知识优势,着重通过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成功嵌入 GVC 上游位置。而美国提出的“制造业回归计划”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嵌入 GVC 生产制造环节,提高中间品贸易规模,使得总出口中 FVA 比重上升。总体而言,基于前向参与的明显优势,美国处于价值链上游水平。其他老牌发达国家的参与度也逐渐上升,前后向参与度变化不大,但后向参与度高于前向参与度,体现了价值链嵌入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伴随着欧洲一体化,欧洲的发达国家将部分生产制造环节外包,只参与核心设计环节,并从其他国家进口低端中间品;另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后,在投资政策自由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制造业格局呈现出模块化趋势,主要掌控制造业上游制造环节(如研发、设计),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以及设计环节逐渐开始外包或依赖国外供给,因此总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比重呈上升趋势。

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和印度拥有着不同的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中国参与度呈现“倒 V 字形”,由 2000 年的 26% 上升至 2005 年的 30%,原因在于这一阶段中国主要参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贸易活动,其国外增加值高达 19%,远高于同期印度的 13%。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并强调自主创新与研发,前向参与度也出现上升趋势,国外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但是前向参与价值链的上升幅度小于后向参与度的下降幅度,因此价值链参与度呈现下降趋势,这从侧面表现出脱离加工贸易模式的迹象。印度价值链嵌入特征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印度承接的服务外包既包括了价值链上游的设计及软件外包,也包括了价值链下游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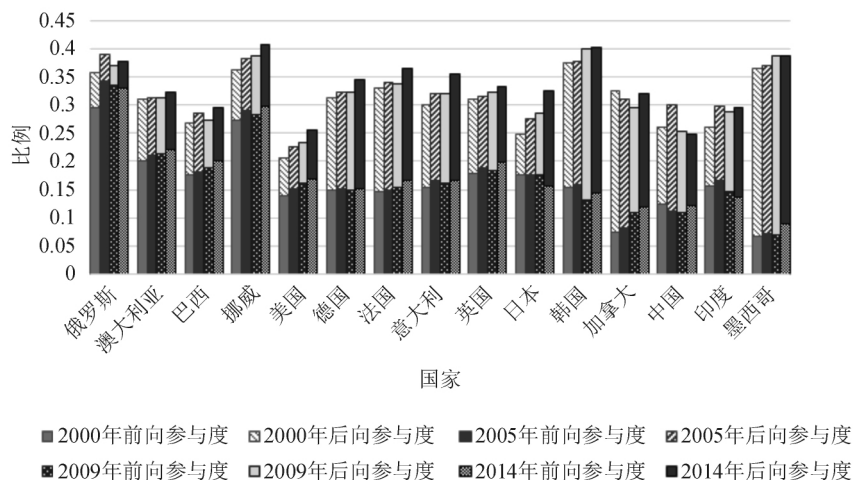


图3 代表性国家价值链嵌入跨期趋势

四、理论机制和模型设定

1. 理论机制

价值链贸易是基于国家间垂直分工协作的一种贸易方式,相对于传统出口贸易,除涉及跨界交付外,价值链贸易还涉及大量的边界内活动与沉没投资活动,中间品会频繁跨越边界,因而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政策管制,相应地价值链贸易对交易成本和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国际投资协定是基于保护国际直接投资的协定,其核心内容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信息交换以及协调和简化的双边投资活动条款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詹晓宁,2007),这

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发展。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最有利于消除投资障碍,减少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进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市场准入要求与投资门槛的放宽使得跨国生产链条不断延长,从而促进价值链贸易的不断发展。信息交换以及协调和简化的双边投资活动条款能有效降低投资壁垒,提高投资效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家违反投资协定的行为提起诉讼,为投资国公平、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提供重要保障,从而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投资成本的降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不确定性的降低提升了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带动了跨国投资发展,本国企业可通过跨国公司融入国际化生产活动带动中间品贸易的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

融投资条款为一体的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属于综合型协定,这样的协定对投资和贸易具有联合促进作用,因而对价值链贸易具有更突出的作用。一方面,RTA的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垂直型生产一体化中的中间品多次跨界往返,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进行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RTA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规则的新前沿,其涵盖的内容和投资自由化程度都远远超越了当代投资协定的范式,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结的RTA中的投资制度代表了当代国际投资条约的新动向,为双边投资协定树立样板。新贸易理论和新贸易地理理论指出,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会在RTA范围内增加投资(Krugman和Paul 2009)。新区域主义的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效应既意味着RTA具有重塑国家间投资布局的作用,也说明了RTA具有加速要素流动、促进生产环节空间分序以及带动不同国家嵌入价值链条中的作用。此外,南北型RTA可以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产品外包,加速生产网络的构建,也催生了更多国家竞争性FTA的产生(Baldwin和Richard,1995),形成更广泛的生产网络。随着越来越多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国际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更加细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加工制造中心。相关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垂直型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互补型生产网络(Athukorala和Yamashite 2006)。上述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决定了价值链贸易的主要格局,即发达国家出口高端中间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相互出口不同加工环节的中间品,经多次跨境后这些中间产品在制造中心装配成最终产品返回到发达国家。在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本国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参与深度与分工位置。

基于上述理论机制,我们可以预期国际投资协定以降低成员间的交易成本及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并通过构建国际生产网络的方式对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价值链贸易产生影响。传统贸易基于产业间分工,在实施国际投资协定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能产生贸易的互补效应;而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北北型RTA是水平型一体化分工,其投资协定实施后投资的增加可能导致对贸易的替代。价值链贸易基于产品内分工,实施国际投资协定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垂直型一体化投资布局,这可能产生中间品贸易的多次跨界往返并带动成员间的垂直分工协作。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投资协定对体现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价值链贸易^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假说2:与单纯的双边投资协定BIT相比,融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RTA会更有效地促进成员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其中的投资条款对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假说3:与北北型RTA相比,南北型和南南型RTA的投资条款对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2. 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国际投资协定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本文借鉴了王直等(2015)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在Mauro等(2019)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以下扩展引力模型:

$$\ln Trade_{ijt} = a + b_1 Invest_{ijt} + b_2 BIT_{ijt} + \beta Z_{ijt} + f_{it} + f_{jt} + f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1)$$

^① 这里的价值链贸易包括国内增加值、中间品增加值、间接吸引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贸易。

在(1)式中 i, j 和 t 分别代表出口国、进口国和时间。

其中 $Trade_{ijt}$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代表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流动,包括:(1)一国或地区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 $Export$; (2)一国或地区对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 $Service$; (3)反映一国真实贸易利得的国内增加值 DVA ; (4)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品增加值 DVA_{int} ; (5)间接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 DVA_{intrex} ; (6)国外增加值 FVA 。 DVA_{intrex} 和 FVA 衡量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情况。 DVA_{int} 和 DVA_{intrex} 反映了一国通过为下游国家提供中间品参与价值链,前者经其国内生产加工后为本国吸收,后者继续向其他国家出口。两者均体现了该国作为上游供应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联系,但后者反映了更长的价值链条。 FVA 反映了下游国家对上游供应者的依赖,一国由于使用了进口中间投入品,从而导致其出口产品中嵌入了一个或多个上游国家创造的国外附加值,因此下游国家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参与价值链表现为该国制造者在 GVC 垂直生产一体化中的后向联系。 Z_{ijt} 代表控制变量,要素禀赋差异是价值链分工贸易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参考陈健(2010)和陈静等(2009)的做法,以两国相对工资水平 RWG 和人均 GDP 差距 $Egap$ 分别衡量劳动和资本要素禀赋差异。此外不同的制度环境意味着不同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良好的制度质量能有效减少贸易摩擦、降低两国的交易成本、改变贸易模式并促进产品内分工,因此选取两国制度质量差距(张中元,2019) $IQgap$ 作为控制变量。所有被解释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为便于下文分析比较,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根据国际投资协定的两种类型,本文用 $Invest_{ijt}$ 、 BIT_{ijt} 两个变量分别来刻画。其中 $Invest_{ijt}$ 表示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规则深度,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其取值范围为 0~3。若国家 i 和国家 j 在 t 时不存在 RTA 或实施的 RTA 中没有涉及投资条款,则取值为 0;若国家 i 和国家 j 在 t 时刻存在 RTA 且涉及投资章节但表述不明确或没有法律约束力措辞,则取值为 1;如果具有法律约束力措辞,但被争端解决机制明确排除在外,则取值为 2;如果 RTA 投资章节在法律上可强制执行,则取值为 3。 BIT_{ijt} 代表双边投资协定,如果 i, j 在 t 时有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其目的在于对比国际投资协定的不同形式对价值链贸易的差异影响。

此外,为控制区域贸易协定其他内容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三组固定效应。 f_{ij} 代表出口国-进口国恒定固定效应,比如地理距离、语言、是否接壤等因素。 f_{it} 和 f_{jt} 代表出口国和进口国时变固定效应,如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等。 α 为截距项 β 代表估计参数 ε_{ijt} 代表随机误差项。

3. 数据来源及变量统计

本文选取 43 个国家(地区)①2000~2014 年的数据。其中,出口总额(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均来源于 UNcomtrade 数据库;价值链贸易数据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 UIBE 数据库(RIGVCUIBE 2016,UIBE GVC Index),该数据库是基于王直等(2015)的研究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为基础构建而成②,该数据库直接提供了投入产出表的分解数据;投资条款深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自 UNCTAD 数据库; $Egap$ 、 $IQgap$ 和 RTA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RWG 数据来源于 EIU 数据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五、经验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2 是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总体来看, BIT 对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双边投资协定的使用

①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美国、保加利亚、巴西、中国、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罗马尼亚、俄罗斯、中国台湾。

② <http://rigvc.uibe.edu.cn/sjzlk/sjk/62923.htm>.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xport</i>	27073	20.027	2.463	3.219	26.707
<i>Service</i>	12236	18.734	2.473	9.234	24.949
<i>DVA</i>	27090	5.877	2.413	-3.920	12.553
<i>DVA_int</i>	27090	4.741	2.462	-7.028	11.967
<i>DVA_intrex</i>	27090	4.399	2.494	-7.593	10.548
<i>FVA</i>	27090	4.499	2.340	-5.313	10.799
<i>Invest</i>	27090	1.281	1.482	0	3
<i>BIT</i>	27090	0.399	0.490	0	1
<i>RWG</i>	27090	1.807	4.071	0.002	274
<i>Egap</i>	25830	22932.150	19639.180	2.587	117649.400
<i>IQgap</i>	24062	16.660	11.505	0	47.202

表 2 深度投资条款对增加值出口与传统总出口的影响

	(1)	(2)	(3)	(4)	(5)	(6)
	<i>Export</i>	<i>Service</i>	<i>DVA</i>	<i>DVA_int</i>	<i>DVA_intrex</i>	<i>FVA</i>
<i>Invest</i>	0.0187 (0.01)	0.0558 *** (0.02)	0.0334 *** (0.01)	0.0360 *** (0.01)	0.0241 * (0.01)	0.0241 ** (0.01)
<i>BIT</i>	-0.0060 (0.05)	-0.1308 (0.08)	0.0115 (0.05)	0.0438 (0.05)	0.0407 (0.05)	0.0036 (0.05)
<i>RWG</i>	0.0013 (0.00)	-0.0011 (0.00)	0.0015 (0.00)	0.0016 (0.00)	0.0009 (0.00)	0.0020 (0.00)
<i>lnEgap</i>	-0.0788 * (0.04)	-0.2737 *** (0.07)	-0.0809 ** (0.04)	-0.0746 * (0.04)	-0.0789 * (0.04)	-0.0574 (0.04)
<i>IQgap</i>	-0.0013 (0.00)	0.0004 (0.00)	-0.0034 * (0.00)	-0.0023 (0.00)	-0.0026 (0.00)	-0.0036 ** (0.00)
D 观测值	22904	10800	22916	22916	22916	22916
R ²	0.9743	0.9747	0.9804	0.9767	0.9743	0.9777

注: (1)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2) 括号中报告的标准误差均为聚类在国家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3) 表中估计结果均控制了出口国和进口国时变固定效应和国家对恒定固定效应。下表同。

范围较窄、运行成本高、法律约束力较弱等缺点导致其经济影响力不断减弱; *Invest* 对出口总额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1)列),但对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2)列)^①,且对分解的各类增加值贸易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第(3)列显示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 *Invest* 对一国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这表明投资条款的实施简化了跨国投资的程序和范围,促进 FDI 与跨国公司准入。FDI 引致的中间品投入和价值链嵌入会提升生产要素的生产与利用效率(Halpern 等 2011),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并提高国内出口增加值(第(3)列),而中间品投入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也会增强一国中间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提高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第(4)列和第(5)列);根据第(5)列和第(6)列,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实施深度投资条款有利于缔约国嵌入价值链分工贸易中。实施深度投资条款后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增加 3.6%,而间接出口增加值增加 2.41%,可能由于间接出口增加值需经进口国加工生产再出口至第三国,在产业

① 因为 RTA 的 *Invest* 条款中包括投资自由化规则,可直接促进成员国间服务贸易的发展。相较于传统的货物贸易方式,新型价值链体系中服务贸易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价值链体系起到“粘合剂”作用,促进了 RTA 各缔约方前后向嵌入价值链。

链条中延伸得相对较长,因此相对于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间接出口增加值对投资条款的敏感度降低。此外,根据第(6)列,深度投资条款也显著地增加了外国附加值。

控制变量相对工资水平(RWG)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影响不显著;进出口双方人均GDP之差($\ln E_{gap}$)显著为负,这表明进出口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太大会阻碍双边价值链贸易的增加;制度质量差距变量(IQ_{ga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进出口双方的制度质量差距对价值链贸易有抑制作用。

2. 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证明了 $Invest$ 、 BIT 与增加值贸易的关系,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增加值贸易规模,但增加值比率也是衡量一国价值链贸易的指标。因此接下来本文将用增加值贸易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检验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几乎没有差别,证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3 深度投资条款对增加值率的影响

	(1) DVA_ratio		(2) DVA_int_ratio		(3) DVA_intrex_ratio		(4) FVA_ratio	
$Invest$	0.0334***	(0.01)	0.0360***	(0.01)	0.0241*	(0.01)	0.0290**	(0.01)
BIT	0.0115	(0.05)	0.0438	(0.05)	0.0407	(0.05)	0.0069	(0.05)
RWG	0.0015	(0.00)	0.0016	(0.00)	0.0009	(0.00)	0.0020	(0.00)
$\ln E_{gap}$	-0.0809**	(0.04)	-0.0746*	(0.04)	-0.0789*	(0.04)	-0.0543	(0.04)
IQ_{gap}	-0.0034*	(0.00)	-0.0023	(0.00)	-0.0026	(0.00)	-0.0027	(0.00)
观测值	22916		22916		22916		22916	
R^2	0.9662		0.9632		0.9573		0.9689	

(2) 样本期间划分问题

根据 Trefler 和 Daniel(2004)的研究,签署 RTA 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并不是瞬间调整的,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使用连续年份的估计将不允许因变量做适当调整。为了减少这种偏差,本文借鉴 Laget 等(2016)的做法,采用两种不同的样本区间划分方法对样本进行重新回归:第一,对跨度为2000~2014年的样本期间采用间隔3年划分区间方法,即样本时间维度为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表4)。第二,对跨度为2000~2014年的样本期间采用间隔4年划分区间方法,即样本时间维度为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表5)。重新划分区间后,深度投资协定的影响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 RTA 投资条款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基本不受样本划分区间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到因价值链条延长使间接出口增加值对投资条款敏感程度发生变化。

(3) 遗漏变量问题

在 Baier 和 Bergstrand(2004)的研究中指出,影响国家间缔结 RTA 的因素几乎都会对双边贸易流动产生影响,这导致在用引力模型研究 RTA 的影响时遗漏变量成为导致模型内生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进一步在(1)式中引入 WTO 虚拟变量,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在加入 WTO 虚拟变量后,RTA 投资条款的估计系数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证明本文揭示的结论有较好的稳健性。

(4) 联立性问题

根据 Tan 和 Qiu(2015)的研究,双边贸易规模有可能会影响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进而会对投资条款的深度产生影响,但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的影响可能性较小,因此为了解决由方程联立性所带来的内生性影响,在样本数据中删除涉及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对,对(1)式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在删除双边贸易协定国家后,深度投资条款的系数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说明联

立性问题并未对本文的结论造成显著影响,本文揭示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样本期间划分法——3 年

	(1) <i>Export</i>	(2) <i>DVA</i>	(3) <i>DVA_int</i>	(4) <i>DVA_intrex</i>	(5) <i>FVA</i>
<i>Invest</i>	0.0638 *** (0.02)	0.0658 *** (0.02)	0.0755 *** (0.02)	0.0820 *** (0.02)	0.0546 ** (0.02)
<i>BIT</i>	-0.0552 (0.07)	0.0129 (0.06)	0.0448 (0.06)	0.0352 (0.06)	0.0203 (0.07)
<i>RWG</i>	0.0022 (0.00)	0.0018 (0.00)	0.0022 (0.00)	0.0018 (0.00)	0.0028 (0.00)
<i>lnEgap</i>	-0.1160 ** (0.05)	-0.0961 ** (0.04)	-0.0887 * (0.05)	-0.0923 * (0.05)	-0.0968 ** (0.04)
<i>IQgap</i>	-0.0001 (0.00)	-0.0034 (0.00)	-0.0022 (0.00)	-0.0035 (0.00)	-0.0025 (0.00)
观测值	6887	6888	6888	6888	6888
R ²	0.9793	0.9844	0.9805	0.9784	0.9823

表 5 样本期间划分法——4 年

	(1) <i>Export</i>	(2) <i>DVA</i>	(3) <i>DVA_int</i>	(4) <i>DVA_intrex</i>	(5) <i>FVA</i>
<i>Invest</i>	0.0683 *** (0.02)	0.0796 *** (0.02)	0.0803 *** (0.02)	0.0931 *** (0.02)	0.0683 *** (0.02)
<i>BIT</i>	-0.0565 (0.07)	-0.0384 (0.06)	-0.0401 (0.06)	-0.0458 (0.07)	-0.0274 (0.08)
<i>RWG</i>	0.0065 (0.00)	0.0031 (0.00)	0.0024 (0.00)	0.0027 (0.00)	0.0058 * (0.00)
<i>lnEgap</i>	-0.0830 (0.05)	-0.0668 (0.04)	-0.0738 (0.05)	-0.0635 (0.05)	-0.0683 (0.05)
<i>IQgap</i>	0.0000 (0.00)	-0.0006 (0.00)	0.0005 (0.00)	0.0011 (0.00)	-0.0010 (0.00)
观测值	5165	5166	5166	5166	5166
R ²	0.9809	0.9857	0.9832	0.9806	0.9827

六、进一步分析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实证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但我们并不明确这种促进作用对不同种类的国家组对是否存在差异性,因为垂直型专业化分工常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之间,为此有必要做出进一步探讨。以下将 43 个样本国家(地区)进一步分为 30 个发达经济体和 13 个发展中经济体^①构成发达-发达、发达-发展、发展-发展三类成员组,将间接出口增加值(间接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 *DVA_intrex* 和国外增加值 *FVA* 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比分析

① OECD 发达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美国,非 OECD 国家(地区)包括保加利亚、巴西、中国、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罗马尼亚、俄罗斯、中国台湾。

表 6 遗漏变量问题

	(1)	(2)	(3)	(4)	(5)	(6)
	<i>Export</i>	<i>Service</i>	<i>DVA</i>	<i>DVA_int</i>	<i>DVA_intrex</i>	<i>FVA</i>
<i>Invest</i>	0.0185 (0.01)	0.0558 *** (0.02)	0.0330 *** (0.01)	0.0355 *** (0.01)	0.0237 * (0.01)	0.0237 * (0.01)
<i>BIT</i>	-0.0060 (0.05)	-0.1311 * (0.08)	0.0116 (0.05)	0.0439 (0.05)	0.0408 (0.05)	0.0037 (0.05)
<i>RWG</i>	0.0012 (0.00)	-0.0011 (0.00)	0.0014 (0.00)	0.0015 (0.00)	0.0009 (0.00)	0.0019 (0.00)
<i>lnEgap</i>	-0.0774 * (0.04)	-0.2735 *** (0.07)	-0.0767 ** (0.04)	-0.0698 (0.04)	-0.0753 * (0.04)	-0.0532 (0.04)
<i>IQgap</i>	-0.0013 (0.00)	0.0004 (0.00)	-0.0034 * (0.00)	-0.0023 (0.00)	-0.0026 (0.00)	-0.0036 ** (0.00)
<i>WTO</i>	0.1449 (0.17)	0.0347 (0.31)	0.4240 ** (0.20)	0.4880 ** (0.24)	0.3646 (0.22)	0.4315 ** (0.18)
观测值	22904	10800	22916	22916	22916	22916
R ²	0.9743	0.9747	0.9805	0.9767	0.9743	0.9777

表 7 联立性问题

	(1)	(2)	(3)	(4)	(5)	(6)
	<i>Export</i>	<i>Service</i>	<i>DVA</i>	<i>DVA_int</i>	<i>DVA_intrex</i>	<i>FVA</i>
<i>Invest</i>	0.0207 (0.01)	0.0815 *** (0.02)	0.0436 *** (0.01)	0.0463 *** (0.01)	0.0318 ** (0.01)	0.0313 ** (0.01)
<i>BIT</i>	-0.0144 (0.05)	-0.1689 ** (0.08)	0.0068 (0.05)	0.0367 (0.05)	0.0351 (0.05)	-0.0028 (0.05)
<i>RWG</i>	-0.0019 * (0.00)	0.0003 (0.00)	0.0003 (0.00)	0.0002 (0.00)	-0.0001 (0.00)	0.0004 (0.00)
<i>lnEgap</i>	0.0023 (0.02)	-0.0985 ** (0.04)	0.0226 (0.02)	0.0165 (0.02)	0.0084 (0.02)	0.0288 (0.02)
<i>IQgap</i>	-0.0002 (0.00)	-0.0004 (0.00)	-0.0028 (0.00)	-0.0020 (0.00)	-0.0019 (0.00)	-0.0027 (0.00)
观测值	22987	10598	22998	22998	22998	22998
R ²	0.9743	0.9750	0.9808	0.9770	0.9748	0.9781

RTA 的投资条款在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组合下对各成员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参照彭若弘和于文超(2018)的方法,采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代替非标准化系数,消除由于组间样本量不同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增加各分类下指标的可比性,具体结果如表 8 所示。

上述结果表明 BIT 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一致,不同类型经济体之间的 BIT 对缔约方参与价值链贸易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且 RTA 投资条款 *Invest* 的分组回归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同。具体表现为:(1)对发达成员间的间接出口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RTA 投资条款对于相互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起到替代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近,对外投资主要导致产品在消费国生产,相互之间出口减少,阻碍其融入价值链。(2)显著促进

表 8 不同类型国家间的投资协定对 GVCs 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结果

	发展中成员间		发达 - 发展中成员间		发达成员间	
	<i>DVA_intrex</i>	<i>FVA</i>	<i>DVA_intrex</i>	<i>FVA</i>	<i>DVA_intrex</i>	<i>FVA</i>
<i>Invest</i>	0.0760 ** (0.04)	0.0676 * (0.04)	0.0410 *** (0.01)	0.0324 ** (0.01)	-0.0212 ** (0.01)	-0.0027 (0.02)
<i>BIT</i>	0.0274 (0.03)	0.0042 (0.03)	-0.0198 (0.01)	-0.0183 (0.01)	0.0119 (0.02)	0.0309 (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82	1782	9630	9630	11504	11504
R ²	0.9544	0.9560	0.9657	0.9713	0.9834	0.9853

了发达 - 发展中成员间融入全球价值链,基于间接出口增加值实现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要略高于后向参与。其原因主要在于,发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的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以及发展中成员对发达成员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有利于发展中成员在融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企业竞争力,进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就发达成员而言,与发展中成员的投资联系会提升其国内要素的配置效率,通常会伴随着具有先进技术的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的输出,这有助于深入价值链并向更高水平延伸。(3) 显著促进发展中成员间融入全球价值链,且其系数大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间系数。发展中成员间的价值链联系依托于生产网络,由于发展中成员国内制度稳定性普遍不高,法制体系不健全,与其他发展中成员缔结深度投资条款为彼此提供稳定的投资框架体系更能降低双边投资风险与投资壁垒,而与发达成员间缔结的深度投资协议存在妥协成分,因此发展中成员间的深度投资条款更符合彼此切实利益,交易成本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更有利于其融入全球价值链。上述结果表明,南北型 RTA 和南南型 RTA 的投资条款能更大程度地促进成员国前向参与价值链,且南南型的促进作用更大。前后向嵌入价值链的程度差异代表着某一经济体在价值链中分工的位置高低,这一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选择 RTA 伙伴和谈判投资条款宽严度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出发对国际投资协定与价值链贸易关系进行考察,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与传统出口贸易相比,RTA 中的投资条款 *Invest* 能显著促进一国国内增加值出口,但双边 BIT 对出口的作用不显著;第二,RTA 中的投资条款 *Invest* 对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呈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双边总贸易影响不显著;第三,RTA 中的投资条款 *Invest* 主要对南北型 RTA 和南南型 RTA 缔约方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北北型 RTA 缔约方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发达 - 发展中经济体的 RTA 投资条款 *Invest* 有助于缔约成员价值链地位提升,发展中 - 发展中经济体的 RTA 投资条款 *Invest* 更有利于发展中成员间深度嵌入价值链并逐渐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区分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和 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不同国家价值链贸易影响的差异性,指出 BIT 对价值链贸易影响不大并揭示了 RTA 中的投资条款对一国不同种类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这让各国政策制定者在参与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时,可以根据本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目的和方式选择不同的策略。中国在 RTA 的谈判和规则制定时应考虑多方面的利益,要注重以提升价值链嵌入为导向的策略,在 RTA 谈判中不仅要关注贸易壁垒方面的讨价还价,还要关注 RTA 投资规则的深度,如是否包括争端解决机制、政策透明度等,通过与发达经济体或发展中经

济体缔结深度投资协定以更大程度地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价值链各环节无缝对接的效率,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

参考文献

- [1] Athukorala P., Yamashita 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 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17(3): 233-256.
- [2]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4(1): 29-63.
- [3] Baldwin, Richard. 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4364, 1995.
- [4] Baldwin R.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J]. WTO Staff Working Papers 2011.
- [5] Berger A, Busse M, Nunnenkamp P, et al. More stringent BITs, less ambiguous effects on FDI? Not a bit!. Kiel Working Paper, No. 1621 2011.
- [6] Bruhn D.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ep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romoting Trade at the Cost of Domestic Policy Autonomy?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 [7] Egger P, Merlo V. BITs Bite: An Anatomy of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on Multinational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14(4): 1240-1266.
- [8] Hallward-Driemeier M.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ly a Bit and They Could Bit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3: 349-379.
- [9] 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R, 2011, 2(3): 1-31.
- [10] Jeswald D W, Salacuse. The Emerging Global Regime for Investment[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0, 51(2): 427-473.
- [11]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224-236.
- [12]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459-494.
- [13] Krugman, Paul. The 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 in Trade and Geograph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3): 561-571.
- [14] Laget E, Osnago A, Rocha N, Ruta M. Deep Trade Agree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R].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6.
- [15] Lederman D, Maloney W, Servén L. Lessons from NAFTA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A summary of research findings [R].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 [16] Mauro B, Marion J, Olga S. Do we need deeper trade agreements for GVCs or just a BIT[J].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6): 1713-1739.
- [17] Sholec M. High-tech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mptom of Technology Spurts or Statistic Illusion[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7, 143(2): 227-255.
- [18] Treffer, Daniel. The Long and Short of 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88(4): 870-895.
- [19] Tan L, Larry D Qiu. Beyond Trade Creation: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Trade Disputes[R]. ERIA Discussion Paper, 2015.
- [20] Vechiu N, Makhlof 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Production in the EU27: Does FDI Influence Countries' Specialization? [J]. Empirical Economics, 2014, 46(2): 543-572.
- [21] 白光裕 庄芮.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投资关系研究——中国的视角[J]. 国际贸易, 2015(6): 16-20.
- [22] 陈安 蔡从燕. 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23] 陈健.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区位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12): 102-107.
- [24] 陈静 Sen S, 胡昭玲. 东亚零部件贸易影响因素及特点分析: 基于引力模型测算(1992~2006) [J]. 世界经济 2009(11): 83-96.
- [25] 陈勇. 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6] 高疆 盛斌. 贸易协定质量会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吗?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8): 3-16.
- [27] 金芳. 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特征与中国的应对[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4): 65-72.
- [28] 李平 江强 林洋. FDI与“国际分工陷阱”——基于发展中东道国 GVC 嵌入度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426(6): 123-136.
- [29] 李艳秀. 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特点、深度与价值链贸易关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8, 7(7): 71-78.

- [30] 刘洪愧. 区域贸易协定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基于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16, 37(8): 127-143.
- [31] 欧定余, 陈维涛.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下的“FDI—贸易关联”——基于中国数据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2(1): 107-111.
- [32] 彭若弘, 于文超. 环境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J]. 投资研究, 2018(10): 41-52.
- [33] 孙英哲. 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发展趋势研究——以 CETA 投资章节为视角[J]. 经济问题, 2018(4): 111-115.
- [34] 孙玉红, 许智贤. 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扩展知识资本模型的实证分析[J]. 投资研究, 2018, 37(8): 44-59.
- [35] 沈铭辉. 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 区域还是全球? ——美国推动 TPP 的行为逻辑[J]. 当代亚太, 2013(6): 70-94.
- [36] 盛斌. 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70-80.
- [37] 杨宏恩, 孟庆强, 王晶.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16(4): 24-36.
- [38]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 112-116.
- [39] 赵立斌. 东盟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地位与跨国公司 FDI[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10): 86-96.
- [40] 詹晓宁. 国际投资体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J]. 国际经济合作, 2007, 5(4): 88-97.
- [41] 张小波, 李成. 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投资机制的构成、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J]. 国际观察, 2016(4): 144-157.
- [42] 张晓静. 亚太区域合作深度一体化与生产网络的关联性[J]. 亚太经济, 2015(1): 3-8.
- [43] 张中元. 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8): 95-108.

(责任编辑: 王丽娟)

tegrating credit and asset price variables , and analyzes the global convergence of financial cycles based on rolling β convergence coeffici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cycles of each economy and the relative Convergence in cor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two-level latent factor model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factors on the fluc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cycles of various economie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Effects of Regional Service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Global Trade in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dded

Wang Xia(42)

This paper makes full use of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of OECD TiVA database and Andreas (2014) database ,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RSTAs on the process of global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estimates show that: (1) RSTA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mong member economies ,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eign value added ex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export and foreign value added export of final products; (2) RSTA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alue-added export growth of final products among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the value-added export growth of intermediate good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alue-added export growth among developing economies; (3) The growth of value-added exports among developed economies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export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Natural Person Movement" and the "Review" provisions commitments , and the growth of value-added expor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export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Natural Person Movement" provision commitments; (4) There is obvious heterogeneity in the phase effects of different liberalization provisions. This study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RSTAs and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Foreign Value-added Rate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Yin Sisi Gao Yunshu(56)

This paper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value added rate (FVAR) , explores the decision-making of firms' product quality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methods. We merge data from both firm level and transactions level to examine the relative problems , and find that (1) the quality of product drops at first and then gradually increases , which forms a u-shape structure. The FVAR reveals comparatively high heterogeneity , and has a nonlinear effect upon product quality; (2) firms'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scale positive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3) the trade structure ha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product quality , i. e. , "small and scattered" export structure and "large and wide" import structure assist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on Value Chains Trade

Sun Yuhong Chen Xiangxiang Yu Meiyue(71)

Based on WIOD and UIBE data from 2000 to 2014 , this paper tested the effects of BIT and Investment clauses in RTA of 43 countries on value chain trade among parties by building extended gravity models.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two on value chain trade a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them , BIT has little impact on value chain trade , but the investment clauses in RTA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bilateral value-added trade between parties. Specifically , the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the RTA facilitate parties' participation in GVCS in both previous and backward participations , and promote forward particip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RTA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value-added trade between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RTA parties , but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value-added trad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RTA parti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benefits of value chain trade , policy makers of various countries can choose different strategies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nego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